

专题栏目: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周文,杨正源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困于新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陷阱,收入分配机制逐渐失灵,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与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问题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问题,又要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与分配的有效统一。平台垄断、数字鸿沟、三农发展欠缺、企业过度金融化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等短板是阻碍当前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问题。基于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发挥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汇聚共同富裕“合力”,其次是要以高标准治理平台垄断,同时重点解决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等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数字经济;新型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454(2023)03-0015-12

引用格式:周文,杨正源.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36(3):15-26.

Citation Form:ZHOU Wen, YANG Zhengyu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 36(3): 15-26.

一、引言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世界市场呈现出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全球经济秩序混乱,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国内矛盾频发。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推动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但依旧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等现实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上承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作为人类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中最恢宏、最壮观的实践图景,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才能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也是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性的深刻把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世界百年

收稿日期:2022-11-06;修回日期:2023-0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7DZJ011);中信改革发展基金“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G2007)

作者简介:周文(1966-),男,重庆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杨正源(2000-),男,江苏盐城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已无法有效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更遑论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内涵,以对未来中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二、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

(一) 贫富分化降低微观主体的消费与创新动力,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总量从 3 678 亿元增长到 1 143 669.7 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的背后,仍然不能忽视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具体如图 1 所示)。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7 411 元,而农村居民仅为 18 900 元,城乡收入倍差为 2.5 倍;2021 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4 980 元,中部地区为 29 650 元,西部地区仅为 27 798 元,区域收入倍差分别为 1.51 与 1.62 倍;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较为显著,2020 年农林牧渔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为 48 540 元与 82 783 元,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为 177 544 元与 133 390 元,工资收入倍差高达 3.66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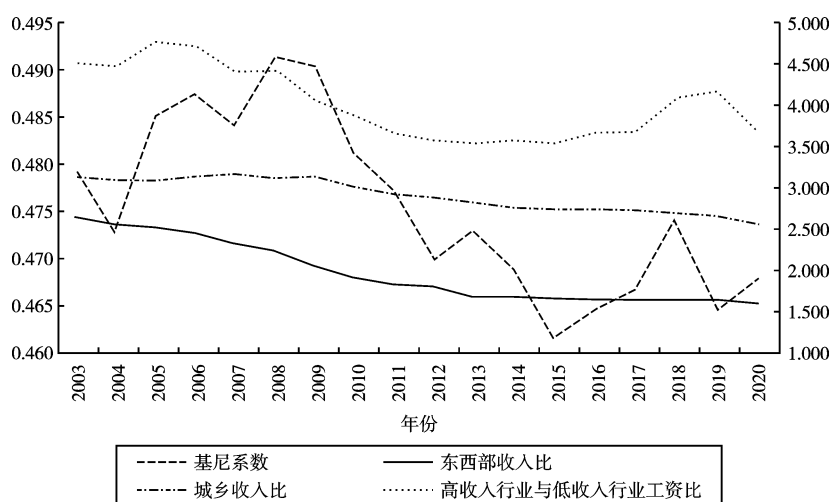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20 年中国贫富分化状况

如果贫富分化过于明显,那么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不振。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滑,进而倒逼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雅各布斯与马祖卡托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管制会引起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但是,泡沫的最终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当泡沫破裂时,经济最终会陷入衰退。”^[2]例如美国为应对 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消费负增长,一度将利率降至 0.25%。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将 2 万亿国债融资发给普通家庭。这轮货币超发引发了股价、房价、物价、工资全面大涨,形成了新一轮通胀局面。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富人来说,货币宽松加速了富人财富的膨胀;但是对于社会而言,通胀最大的危害是削减普通家庭的购买力,提高生活成本,扩大贫富差距。普通家庭的收入多数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品价格上涨对普通家庭的影响要远大于高收入家庭。

从长期看,贫富分化易造成创新动力不足,平均教育水平降低等问题,压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撑,随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收入结构趋向于两极化,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在美国,如果处于收入分配的底层,那么他们将不仅缺乏教育机会,也缺乏获得充足营养和健康的机会。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因的研究表明:“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 3/4 可以归结于知识资本”^[3]。当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过多时,经济不仅会为今天疲软的需求付出代价,也会为未来更低的增长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贫富分化压缩了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了创新主体的发展前景。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大幅度降低。而当下由于高传染性疫情突发和高级别的管控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预期,更加抑制了市场投资和消费信心,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此外,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还会扭

曲社会价值取向,也就衍生了当下“寒门再无贵子”“躺平”等社会思潮。年轻劳动力丧失奋斗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二)西方制度陷阱下的高福利陷阱

二战后的三十年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黄金时代的特征是高就业、经济高增长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平均分配。面对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西方国家普遍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福利计划,诸如贫困救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补助等。那么问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措施真的是作用在底层贫困人民身上的吗?真的是从劳动人民获得更好生活质量的角度来执行政策吗?

一方面,人们由于身处媒体编织的信息茧房中,误认为其社会福利的分配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然而《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却指出政府只会利用福利政策去迎合那些能够为选举作出更大贡献的中产阶级,而不是那些缺少资源的底层人口^[4]。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下的民主政治诱使执政党通过增加公共福利开支,以赢得选举。因此社会福利更会优先覆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官员等。另一方面,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北欧五国作为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均已在50%以上。也只有在高税收的基础上,北欧国家才能为国民提供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失业救济金等保障。其固有的福利刚性使这些国家背上了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西方福利社会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固有的基本矛盾,将从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那里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通过社会福利形式部分返还,以持续不断地剥削累积剩余价值^[5]。正如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所说:“总而言之,福利国家是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而不是使其改变的一个环节。”^[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7]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的无限增值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必然会呈现出高度的贫富悬殊的现象。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以自由化、私有化与市场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种下的恶果,深刻表明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个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显然,即使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落入“制度陷阱”,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择中反复挣扎。

(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民亦劳止,讫可小康。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革命,大同社会已经成为历代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这其中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才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彼岸^[8]。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9]共同富裕这一词拆解来看,“富裕”代表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本质体现。“共同”则是指全体人民一起享用发展成果,是生产关系的根本概括。党的十九大以来,共同富裕在顶层战略中的身影出现得愈发频繁。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重要场合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支持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步骤,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不但要实现社会财富不断涌现,而且更要实现社会财富共享。在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分配制度失灵,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中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汇聚共同富裕的“合力”,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活力,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不忘农村集体与广大中小微企业,以乡村振兴着力补齐共同富裕的“短板”,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10]。这对于全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道路无疑是指明了另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11]。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一)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欧美发达国家走向繁荣完全是自由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仅仅起到“守夜人”的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针对这个问题,历史不断地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自由贸易并不能为一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发展提供根本性动力,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过于强调贸易的重要性,陷入了“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泥潭,而忽视了生产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高质量发展把生产力的提高作为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政府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刺激经济发展。

17世纪英国政府制定了《航海条例》,规定凡运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只能使用英国船和英国船员。19世纪,为解决农业危机,颁布了《谷物法》与《工厂法》。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针对国内公司提供公共采购优惠,并为衰落和新兴产业提供直接补贴,以改善其不断下降的生产力和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提高现有产业的竞争力。德国的情况颇为类似。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相较于市民社会来说地位更重要。为了扶持本国工业的发展,俾斯麦通过对粮食和工业品征收高额进口税,而对原料则给予免税待遇,坚决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在工业化时期,联邦政府为煤炭、钢铁和造船业等产业提供大量补贴和有保障的国内市场。

此外,德国政府还提供补贴、项目拨款和税收优惠,以支持新兴的生物技术、计算机、航空航天和核能产业。而以市场自由化著称的美国,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均发挥了政府的作用。赖纳特指出:“一旦回到国内的现实问题,美国便举起了保护主义大旗。”^[13]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涵盖钢铁、铜、煤、谷物、棉花、玻璃、火药等众多产业的制造业发展计划,开启了美国政府推动工业化的正式篇章。二战期间,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苏法案》促成了1933年国家复苏局的成立,1942年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更加重视对基础研究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奥巴马政府则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拜登政府则是推出了累计补贴金额高达867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英美两国的做法并非特例。亚洲的日本、韩国,北欧的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国通过历史上的制造业保护策略扶持本国产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60年代至80年代的韩国均是通过政府的有效支持来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的“五年计划”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通过“五年计划”,中国政府通过目录指导、优惠税收待遇、各种补贴、研发的研究补助、政府采购及建立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等方式支持工业发展。然后,在政府的指导下,更多的要素投入和资源被分配给这些重点产业。“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造就中国经济奇迹,在于它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动员和激励各方为实现目标而共同奋斗;在于其能够抓住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助于确定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协调各种资源的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都为后续计划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制度和政策基础^[14]。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则集中体现于制造业中。瓦克拉夫·斯米尔指出:“如果一个发达的现代经济体要想真正地实现繁荣富强,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大、多样和富于创造性的制造行业。”^[15]制造业是综合国力竞争、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从制造业规模看,我国制造业总量指标领先,但人均指标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结构、安全、品牌、创新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制约了制造业产业体系的完善和深化。雅各布斯和马祖卡托发现:“创新同样需要资金充足的公共研发机制以及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从我国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密集的产业技术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上天有神舟、入地有盾构、追风有高铁”,中国这三大重要基础设施正是在政府的引领下成功被公认为世界级领跑产品、国之重器。

(二)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分配公平的根本出路

共同富裕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正如奥肯所言:“效率与平等都有价值,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先权。要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要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16]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分配制度体系改革,使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形成一个主次有序的制度体系,切实将高质量发展的累积财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民福利^[17]。具体来看,政府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将先进生产要素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区域收入差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数据资源与产业的交汇融合来促使社会生产力发生新的飞跃,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社会价值,从而更好地促进全社会协调发展。

从产业转移视角考虑,得益于区位优势与政策的扶持,以及我国加入 WTO 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在 2000 至 2008 年的近十年间,出口对我国经济腾飞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过高的要素成本、环境约束趋紧以及出口需求减弱等现实难题下,传统的产业发展优势逐渐减弱,全球加工制造业不断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与东南亚迁移。为此,国内产业转移成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抓手。自 2010 年国务院首次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来,先后共设立了 10 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覆盖了我国中、西部 35 个城市。产业转移不仅能给承接地区带来大量的资本投资、生产技术和生产主体,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还能给承接地区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产业转移政策往往包括财政转移、土地、税收和金融信贷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能够更好地释放产业转移的正向效应,扩大产业发展规模,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以调节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态势。

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视角考虑,在数字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相关应用场景不断延伸。数字技术凭借其普惠性和分享性特征正成为“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量。数据要素具备强大的智能化采集、处理、分析与应用能力,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能节约劳动时间,使得数字技术在重复单一性、可程序化以及具备特定生产与工作流程的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数字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交易成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分工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18]。

数字经济打通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膜,对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工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可以使得位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进行生产,打破传统的单一生产线模式,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平台通过高效整合与利用经济体中存在的大量闲散与灵活的劳动力,孕育出诸如电商、外卖等非技术性岗位,从而实现要素的自由流转与优化配置,增加了普通从业者的收入。新业态打破了传统的长期雇佣制,存在雇佣门槛低、用工方式灵活、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等特性。平台消费端的大数据也可以反过来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从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小规模农业系统的存在和市场的完善,小农户面临着进入市场的挑战。这些限制使小农户难以从市场交易中获益。电子商务为农村家庭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当地商品的机会,被证明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市场准入和促进就业机会的有效途径。事实上,电子商务在中国某些地区迅速成功崛起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当地政府提供了更好的互联网接入、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和支持。不仅是中国,在摩洛哥、伊朗与印度等国家,农民均已在政府的支持下采用电子商务在网上销售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障碍

(一)数字鸿沟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历史经验早已表明,只有实现“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才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要避免平台垄断与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为数字时代的“边缘人”。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大量涌现,标志着新经济的崛起以及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经济参与方式的变

革。然而,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平台经济中的头部企业集中的市场资源越来越多,又由于用户转移成本较高,平台企业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垄断,出现“马太效应”,从而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实现“赢者通吃”的局面^[19]。这不仅影响了正常交易秩序,也挤占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例如,外卖骑手受困于数据算法,无法实现自身的劳动价值。同时,数字平台因汇聚海量用户而引发的流量垄断,也会出现如“大数据杀熟”等现象^[20]。垄断实质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通过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种扰乱资源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秩序的不健康数字经济发展现象会引发消费者隐私泄露、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与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当消费者习惯使用数字巨头某一服务时,其转而使用其他数字巨头相同服务的成本增加。利用这一特点,数字巨头围绕生活圈进行跨界扩张。例如,腾讯将微信从单一的社交通信领域扩展到生活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金融理财等诸多领域。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互联网资本巨头掌握着充分的个人隐私信息和用户流量数据,进而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挤占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例如,大平台在初期会以持续的低价倾销等手段会在一段时间内挤压中小竞争者的生存空间,等中小竞争者资本不足以支撑亏损时,行业就进入出清阶段,中小竞争者接连出局,数字巨头便顺利生存下来,进而谋求垄断整个行业。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差距,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存在获得数字红利的机会以及在使用上的显著差距。虽然技术革命为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欠发达地区却难以跟上信息通信技术和区域发展的步伐,这可能在地区之间产生数字鸿沟。高技能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学习与调整能力可以快速适应技术冲击,而较高的岗位准入门槛与教育培训成本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短期再就业难度较大。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性所引致的技能需求分化与技能收入差距扩大会提高技能溢价,产生“工资极化”现象,那些拥有高人力资本、高技能的劳动者从数字化浪潮中获益更多,导致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超过高技能劳动份额上升幅度,最终会扩大了收入差距。例如,参与了商业性的在线共享的更多的是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年轻人。从教学信息化的角度来看,发达地区的孩子们享受了优质师资、内容和服务,而一些西部地区的孩子们则不能享受同等教育水平。

此外,正如美国学者韦斯利·弗莱尔所比喻的“数字难民”一样,相比从小浸染在数字环境中的年轻一代,那些不懂得如何使用数字设备的老年人,在很长时期内被排斥到数字世界之外。随着健康码、行程码、无接触支付等符合防疫需要的数字技术手段的出现,智能设备愈发变成日常生活的“刚需”。在某些场景中,“亮码通行”“扫码预约”甚至成了唯一选项,这迫使很多老年人不得不加快适应数字化生存的步伐。老年人对新技术天然的风险感知和技术恐惧、诉求缺失和技能匮乏等个体因素使得其在数字化时代常常感受到寸步难行。简而言之,数字鸿沟的出现则可能扩大了贫富差距与影响了社会公平,使弱势群体难以分享数字红利。

(二)“三农”发展仍存在较大不足

要实现共同富裕,其重点难点在“三农”。农业是保障饭碗的基础产业,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大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从农业现代化视角来看,农业发展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是,中国农业长期粗放式发展导致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威胁着农业的可持续性。广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耕地破坏、水污染和环境恶化,压缩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农业产业集聚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区域分离模式。主要农业地区水土资源的匮乏正在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用占世界 7% 的耕地和 5% 的淡水资源养活占世界 20% 的人口,是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虽然近年来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但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追求“数量型农业”转变为追求“质量型农业”。一方面,农业作为家庭收入的来源大幅下降,以至于一些农民将土地闲置,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进一步增加,大量的耕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使得人地矛盾突出。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虽然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是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体就业人员比重也不断下降。这也和国

际上的历史实践相吻合,一个国家在进入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时代后,其农业的产业竞争力就越来越不如工业、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在与工业城市的竞争中落败,从传统社会价值的核心地位跌落到现代社会价值的边缘。

表 1 1978—2021 年中国主要“三农”指标变化

	1978	1992	2002	2012	2017	2020	2021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27.69	21.33	13.30	9.11	7.46	7.65	7.30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三次产业比重(%)	70.5	58.5	50	33.5	26.7	23.6	22.9
农村人均年收入(元)	134	709	2 476	7 917	13 432	17 131	18 931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11 750	30 308	57 930	102 559	98 783	105 622	107 768
耕地面积(万公顷)	97 221	123 562	120 649	119 959	119 491	126 581	...
粮食产量(万吨)	30 477	44 266	45 706	61 223	66 161	66 949	68 285

注:数据整理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此外,从中美两国农业劳动效率来看,由于“先天不足”,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2019 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6%,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具体见表 2)。与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相比,中国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以玉米为例,2018 年中国每吨玉米生产成本是美国的 2.21 倍。此外,可持续农业生产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截至 2020 年底,有 3 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节水灌溉面积为 5.67 亿亩,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仅为 29.5%,远低于以色列等集约式利用农业资源国家 80%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化肥折纯使用量达到 5 250.65 万吨,亩均 27.38 千克,远高于国际公认的 15 千克的安全上限。

表 2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差异

	1991	2000	2010	2011	2012	2017	2018	2019
全球	1 442	1 969	1 977	2 740	2 899	3 001	3 743	3 869
中国	955	1 419	1 437	2 795	3 059	3 302	4 906	5 257
美国	58 562	61 645	71 173	82 862	75 264	74 561	88 209	95 475
中国/全球	0.66	0.73	1.02	1.06	1.10	1.31	1.36	1.39
中国/美国	0.02	0.02	0.03	0.04	0.04	0.06	0.06	0.06

注:劳动生产效率计算方式为农业增加值/农业就业人数,单位为 2010 不变价美元,数据整理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最新数据只更新至 2019 年

从农村现代化视角来看,一方面,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改革开放初期增强了农民在生产生活领域的自主性,增加了国家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力。包产到户小农经济模式一方面不利于农业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加速了农村社会原子化个体的形成,解构了集体存在。村民跟集体的联结逐渐式微,村庄公共事务无法有序、有效开展。从而导致乡村社会既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又难以联结和凝聚松散的农民个体,进而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整体能力^[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22]。农村现代化的不足,其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衰落。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内生动力。共同富裕要求居民平等接受教育和技能的机会不断提升^[23]。但现实却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特别是青壮年的进城引发了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问题,这显然不能代表农村现代化的达成,反而对农村现代化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空心村”的出现会导致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缺乏劳动力支持,当地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在招收劳动力时,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劳动力素质偏低等情况,产业缺少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深水区”和“硬骨头”。事实上,即使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大多从事的也是简单、机械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城乡之间的教育、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已经成为公共服务最大的痛点之一。在消费数字化的转变下,城镇居民得以借助数字平台降低其消费过程中的搜寻成本,通过增加消费以增进个人福祉。而农村却由于基础设施的局限与个人技能的不足,并没有享受到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红利。

(三)过度金融化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

由于大规模生产方式庞大的沉没成本,以及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方式转变在短期内面临困难,

导致实体企业利润率下降,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低迷。资本最大程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会转移至金融等高盈利行业,或者驱使产业转移至其他高利润国家。从微观视角来看,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且金融资产能提供更高的回报率时,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制造业企业会将其资本转移到短期收益更高的资本市场。金融化的企业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产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过程^[24]。美国制造业占比过低,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快速退出,开始涌入第三产业,但由于高附加值第三产业对人才素质要求较高,吸纳就业人数有限,导致更多人流向低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如批发零售、教育娱乐等。在数字时代,传统的低技能劳动者将会被快速替代淘汰。理查德·波斯纳(2009)指出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是由于自由市场放任资本逐利所产生的^[25]。归根结底,金融利润只是单纯以货币形态实现的收入转移。实体经济才是商品生产、价值与财富创造的真正载体,是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不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就是被剥削的开始。从我国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离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素嵌入不足、附加值低,许多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面临被“卡脖子”的危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20年工业竞争绩效指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的工业竞争绩效指数(CIP)为0.37,处于全球第二位,但“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等4个指标仅位于G20中游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反映了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实力不强、人均规模不高的特征(具体数据见表3)。

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正式开启了美国排除中国的全球产业链重置行动,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构建,将使全球化分裂进一步加剧。其背后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打压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高端企业,来摧毁中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信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阻断中国高科技企业崛起。

表3 中美两国制造业与高技术领域对比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2018	2019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中国	31.778	32.09	31.61	28.95	28.11	27.84	26.77
	美国	15.12	12.99	11.93	11.63	11.13	11.2	10.93
中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	中国	45.49	57.67	60.52	58.72	59.96	60.53	61.422
	美国	75.52	70.39	64.75	65.29	63.57	62.31	63.308

注:数据整理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五、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更好汇聚共同富裕的合力

纵观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政党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当今世界,西方从雅典时期至今一直存在并长期作为底层逻辑的商业政治已无法健康持续。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往往囿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短期利益,不能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无法着眼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大资产阶级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对执政党进行游说甚至以利益输送等手段影响决策,并进行竞选政治献金以达到他们自身所在利益集团的目的。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议员往往更多地追求声望、职位权力与金钱,他所提出的议案对于国家发展并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此外,国家治理绝非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而西方政党的不良竞争和轮替,大大影响了其治理体系的落地和治理措施的持续性,长此以往,势必阻碍国家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一方面,“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6]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西方政党的自利性、狭隘性,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了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自身的先进性,不断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探寻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不断与时俱进^[2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关于发

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是“共同富裕”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就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规划了以 2020—2050 年“两个十五年”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坚持“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打击平台垄断”“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等一系列新观念,更好地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促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更好汇聚共同富裕的潜力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多元的融合发展提升了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使制造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以信息、现代服务、基础设施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率先形成国际领先的完善的制造业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历史的经验证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监管都不可行。为了限制垄断、保护竞争,西方发达国家均制定了严格完善的反垄断政策的基本框架,规范了经济竞争的秩序^[27]。有效的市场有利于跨区域竞争与合作,通过兼并、收购和开拓新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收紧对数字巨头的监管已然是世界趋势,欧盟、美国、德国都已采取应对数字巨头垄断平台的措施,并试图借助反垄断重新激活创新。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紧接着 2021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了对于平台经济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的原则。中国互联网行业结束了将近 20 年的“监管宽松”,开始进入强监管的大周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阿里、美团、滴滴、腾讯等公司陆续出台各类整治措施,主要体现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打击网络平台信息泄露。我国也应革新监管态度和制度,让各方参与进来,逐个破解监管难题,共同化解数字巨头跨界扩张的潜在风险,共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进而在数字时代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充足动力。

为消除城乡区域数字鸿沟,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农村加快布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从而巩固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发展驱动力。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群众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红利,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新时代下数字经济跨越空间的信息传播、数据创造和数据共享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形成城乡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动空间”,促使城乡有机融合。同时,数字经济的集聚扩散机制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进而形成城乡共享高级人力资本的体制机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将会促使地区创新能力提升,而创新驱动的边际递增效应又将有利益于城乡多维度有机融合。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等手段,解决了市场经济的要素匹配路径,优化了要素配置效率,形成城乡市场的合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由线下转移至线上。应降低相应服务的使用成本与准入成本,借助数字方式减缓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间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例如,每年春运期间,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人员流动现象。而数字时代的年轻消费者更多地习惯于通过 12306 等 APP 进行网络购票,但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于网络购票方式不太熟悉。为此,12306APP 专门推出了爱心版这一专门适合老年人群体的模式,这一模式有着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等特点,可以更方便地为弱势群体打通线上线下的“最后一公里”。

(三)大力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紧迫任务。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表决通过,强调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增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活力。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物质基础。随着市场化因素不断嵌入农村社会,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总体性变化。同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支持和农业保险机制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生产为人类生产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即“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

业作为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并将农业现代化置于重要基础地位。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农业现代化上升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对于农业农村的重视程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肯定了“小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推进方向。适度规模化经营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规模化大农业,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的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继而在其内部形成专业化的分工,有助于改变粗放型经营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提升农业生产者的素质和应用现代化生产器具的能力,从而适应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机器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使得我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因此要想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维护国内粮食安全,就离不开补贴扶持政策。除了种植补贴、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等补贴项目外,还从种业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到畜牧业提质增量的全产业链补贴扶持规划,并鼓励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第一个就是“产业兴旺”。为此国家专门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在侧重通过城市辐射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外生推力带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日益重视农村的主体地位以及内生动力,通过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和升级缩小城乡差距。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构建新型乡村产业体系,提升了农村经济质效和农民收入,对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的作用。伴随着生产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现代化科技的应用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例如,在第二、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变革、管理经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衍生出农村电商、绿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进而丰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强化农民增收后劲,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通过培育特色龙头企业,并规划特色产业园区,吸引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资源要素的聚集,使相互关联的企业共用基础设施、共享信息、技术外溢,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确保通过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项目补齐短板,大大提高地方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浙江开化龙顶茶”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产业早期发展阶段,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农民种植新品种和购买专业机器,促进产品的多样化和标准化。在工业扩张期后出现质量危机时,地方政府建立了产业协会,制定了行业规则规范了管理。在扩张市场时期,地方政府大力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持续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在品牌创新阶段,当地政府不断提高进入壁垒和滥用成本,从而保护区域公共品牌,有效提高了“开化龙顶茶”的知名度和公信力。此外,共同富裕不仅指收入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还包含着社会福利和福祉,如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直观体现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进村,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性建设。

(四)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始终是实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由科技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引致的更高、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此,将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掌握在中国本土企业手中,不仅关乎中国能否继续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维持正常出口能力,更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安全发展。中国力主构建国内产业链主导的经济循环体系发展战略及其针对产业链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突破策略,必然重塑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28]。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目的在于加强制造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虽然我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已经过半,规模远高于制造业,但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只能是制造业,服务业则往往随制造业流动和转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具体来说,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府正是以一系列的补贴及简化政府审查和批准程序来为制造业的繁荣提供持续动力。传统制造业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通过投入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以生产线替代简单劳动力、以机器替代低中技能工人的途径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而高端生产装备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则依靠密集的自主创新研发活动及升级智能制造体系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投资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级工程师与科学家,逐步从“人口红利”过渡至“人才红

利”,是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

在我国大力发展实体产业的背景下,我国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就需要充分释放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让一切有利于制造业繁荣发展的要素充分流动。共同富裕并不否定市场经济,相反市场经济还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能为共同富裕创造巨大社会财富^[29]。现在,党和国家特别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而国际经验表明,产业基础能力很大程度上由“专精特新”企业所决定,那些掌握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基础工业软件领域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是制造强国的真正基石。围绕国家制造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和“卡脖子”清单等,政府应当对具有“专精特新”发展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潜力的企业早发现、早培育。与此同时,让民营企业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建造者。新时代的民营企业既要发挥好创新、冒险、创业、宽容、工匠、契约等精神,推动民营经济实现充分发展,又要自觉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将个人命运、企业发展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联系起来,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六、结 语

在资本主义平等观中,国家只需负责提供平等的机会,而发展结果的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完全是个人的责任,与国家无关。国家发展以效率为核心,轻视甚至忽视了公平,构成“贫民窟”与“百万富翁”共存的讽刺画面。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阶级、某个民族,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展现出资本主义制度所没有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共同富裕实现的道路上不断优化自己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中国贡献。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问题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问题,又要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深度融合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选择的双重优势,要在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位一体的情况下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以高级生产要素对接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需要稳定发展吸纳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新兴产业竞争的科技创新行业,夯实共同富裕的长期基础。同时,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保障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迈克尔·雅各布斯,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重思资本主义: 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M]. 李磊,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202.
- [3] 埃里克·哈努谢克, 卢德格尔·沃斯曼因. 国家的知识资本: 教育和经济增长[M]. 银温泉,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76.
- [4]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 郑秉文,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35.
- [5] 谢岳.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0): 4-25.
- [6] 克劳斯·奥菲. 福利国家的矛盾[M]. 郭忠华,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8.
- [7]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1-5.
- [8] 周文, 唐教成. 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2(4): 5-14.
- [9]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10] 周文, 施炫伶. 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3): 3-23.
- [11]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1-5.
- [12] 周文, 李思思. 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4): 43-60.
- [13] 赖纳特.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M]. 杨虎涛,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9.
- [14] 周文, 司婧雯, 何雨晴. 繁荣与富强: 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35.
- [15] 瓦克拉夫·斯米尔. 美国制造: 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M]. 李凤梅, 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4.
- [16]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 重大的抉择[M]. 陈涛,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7.
- [17] 蒋永穆, 谢强.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4): 97-105.

- [18] 师博. 数字经济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2):182-197.
- [19] 周文, 韩文龙. 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 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3):103-118.
- [20] 周文, 刘少阳.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J]. 管理学刊, 2021(2):1-9.
- [21] 周文, 刘少阳.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 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7):47-59.
- [22]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195.
- [23] 洪银兴. 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2(2):5-15.
- [24] 谢富胜, 匡晓璐, 李直. 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与中国的抵御探索[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8):29-42.
- [25] 理查德·波斯纳. 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M]. 沈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3.
- [2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12).
- [27] 吴玉岭. 扼制市场之恶: 美国反垄断政策解读[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58.
- [28] 郭晗.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2):20-24.
- [29] 周文, 司婧雯. 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4):85-94.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ZHOU Wen, YANG Zhengyuan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70s, Western capitalist nations have become ensnared in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resulting in a deteriorating mechanism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 weakening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has led to a stark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poor, which is not simply a consequence of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but rather a challeng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during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a crucial aspec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centered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promoting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o attain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several obstacles remain, inclu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the digital divide,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 over-reliance on financializ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a low-end lock on the value chain, hindering the attain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and advanc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give full expression to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gather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 standards in address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s well as addressing key issu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proportion of manufacturing.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al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new collective economy

(责任编辑:任红梅)